

# 文革中軍官的集體觀見

• 唐少杰

**摘要：**1967年9月至1968年8月，毛澤東前後十多次接見共計10餘萬名人民解放軍團職(包括副團級)以上的幹部。這種接見活動可謂文化大革命初期毛所從事的一種意義深遠和影響非凡的活動，甚至可與毛1966年8月至11月前後八次接見1,100多萬紅衛兵及青年學生的作用相提並論，但以往的文革史研究疏於探討這種接見軍官的活動。事實上，在文革進入第二年之後，對於毛而言，他已不再着意尋求第一年來自廣大造反派及激進學生的全面響應或積極互動，而是力圖切實地取得解放軍及其高、中級幹部的全力以赴的支持或無條件的服從，從而真正保證毛澤東思想及文革的全盤進行。本文評述了毛接見解放軍幹部活動所具有的三個特定方面的內涵，並論及這種接見活動的某些特點。

**關鍵詞：**毛澤東 文革 接見 解放軍 團職幹部

毛澤東在文化大革命時期有兩類非常關鍵的接見活動：一類是1966年8月18日至11月26日在北京先後八次接見來自各地1,100餘萬紅衛兵學生和群眾代表等；另一類是1967年9月下旬至1968年8月中旬在北京先後十多次接見解放軍10餘萬團職(包括副團級)以上幹部<sup>①</sup>。人們對於前一類接見活動頗為熟悉，論及較多，而對後一類接見活動不太注意，較少提及。

筆者的一位親人1968年6月下旬來到北京，參加了這種毛澤東接見的活動。在與自己的親人討論這種接見活動時，筆者心中就泛起了探究這類接見活動的想法。無獨有偶，2011年夏天，筆者在讀邱會作與次子程光(邱承光)關於文革的對話錄時<sup>②</sup>，看到他們父子也談及了這類接見活動。筆者個人認為，邱氏父子的這一談論，大概是迄今為止的文革回憶和研究作品中第一次提及毛的這類接

見活動。儘管現今還受到有關文獻資料沒有開放或沒有解密的限制，但是筆者認為，對於這一問題的探討很值得研究文革的學者加以重視。

## 一 集體觀見的由來

毛澤東在1967年初文革進入高潮之後，特別是在同年武漢「七二零事件」發生之後，他與解放軍尤其是與解放軍高、中層幹部的關係，出現了前所未有的狀況，體現了整個文革初期這種關係前所未有的非常微妙的特點。所以，毛出於種種考慮，更多地是基於他本人的文革戰略及策略，決定接見解放軍全軍現任的團職以上全體幹部。正如邱會作所指出的：在「七二零事件」之後，「毛主席提出加強對幹部進行思想教育，建議辦學習班，軍隊要對全軍團以上幹部輪訓一遍。軍委辦事組承辦了此事，每批都有來自全國各地的上萬人到北京學習。那些終日被『炮轟』揪鬥、焦頭爛額的各省市的領導幹部，那些整日被糾纏得疲憊不堪的軍隊三支兩軍幹部，終於有了喘息的機會。」<sup>③</sup>不過，在筆者看來，對於毛而言，接見軍隊幹部主要不是甚麼使解放軍廣大幹部得以喘息的機會，而是毛在文革初期對於他與解放軍之關係的一次重大、具體的深化，是使解放軍整個幹部隊伍的上上下下更加有力、更加有效地與文革保持一致的契機。程光給這類接見活動做了一個比較恰切的定位：「毛澤東一次又一次地接見軍隊人員，可以和1966年他接見紅衛兵相比。他為了發動紅衛兵搞文化大革命，搞了八次接見，檢閱了上千萬紅衛兵。現在他大量地接見軍隊幹部，和接見紅衛兵是不是異曲同工？要求軍隊支持他搞文化大革命。」<sup>④</sup>

對於毛而言，接見軍隊幹部主要不是使解放軍廣大幹部得以喘息的機會，而是毛在文革初期對於他與解放軍之關係的一次重大、具體的深化，是使解放軍整個幹部隊伍的上上下下更加有力、更加有效地與文革保持一致的契機。

李作鵬在其回憶錄中提及這種接見時，更多地是從他所主持的海軍文革的角度來談的<sup>⑤</sup>：

從1968年1月起，海軍辦了六、七期學習班，每期時間二至三個月，每期人數有百餘人，參加學習班的幹部共計千餘人。學習班的學員，主要來自海軍開展四大單位中的團、處級以上的領導幹部和參加各省地方「三支兩軍」工作的海軍各級幹部。讓他們脫離原單位，集中到北京學習。……1968年5月20日，毛澤東、林彪及其他中央領導接見了海軍參加毛澤東思想學習班的全體同志。毛、林接見海軍學習班的學員，不僅使參加接見的學員倍受鼓舞，而且也是對海軍以毛澤東思想學習班的方式解放幹部的肯定。

從這一回憶裏，很難看出毛澤東在其接見軍隊團職以上幹部的活動中所起的主導作用。而在邱會作的回憶中，毫無疑問地把這種接見的由來歸置於毛。邱會作談到，平常請毛出來是很難的事情，「而那時毛主席興致非常高，只要軍委辦事組請，他就來接見，可以說是不厭其煩。各總部、軍種、兵種、各大軍區來京學習人員，陸海空三軍學習毛著先進表彰大會的代表，他接見了個遍，有時還問我們還有要見的嗎？在接見現場，我們把各大單位的領導介紹給毛主席，他都要一一握手，遇到認識的，還要說上幾句話，顯得非常親切。」<sup>⑥</sup>可以說，

正如毛接見上千萬名紅衛兵和群眾代表是他自己的主張和決定，毛接見解放軍十餘萬團職以上幹部也完全是他自己的主導和鋪排。

## 二 集體觀見的內涵

顯而易見，毛澤東接見解放軍十餘萬團職以上幹部的活動是毛在文革進入第二年和第三年的一項重要舉措。這種活動主要具有三方面的內涵：

首先，毛澤東接見軍隊幹部的活動與他接見紅衛兵學生和群眾代表的活動，既有相似的地方，又有不同的特點。毛八次接見紅衛兵學生和群眾代表，這既是毛一生中一項獨特而又重要的活動，更是毛發動和引導文革的一項必要而又深遠的舉措。通過支持和推進紅衛兵運動，具體地說就是通過接見廣大的紅衛兵學生和群眾代表，毛不僅建立起一支使文革衝向中國大陸社會各個領域、各個階層和各個角落的所謂「天兵天將」，而且以紅衛兵運動迅猛而又突進的狂飆清除了來自中國共產黨領導層內的、被毛稱為「三個很」（「很不理解、很不認真、很不得力」）的文革阻力<sup>⑦</sup>。毛以接見紅衛兵的方式，讓紅衛兵來北京「朝聖」和「取經」，觀摩和吸取北京的文革運作經驗，無形之中就促成了把紅衛兵運動作為使文革貫徹、普及、深入到全社會的「政治推土機」。毛在中央、在黨內、在全國找到了致使文革廣泛而又迅速地運行起來的模式。所以，毛接見紅衛兵，從文革全局或整體意義上講，是把文革全面鋪張開來的一大創舉。

但是，僅過了大半年，毛澤東就不看好紅衛兵了。例如，毛1967年2月接見阿爾巴尼亞黨政代表團、5月接見該國軍事代表團時，就對紅衛兵學生及其造反派代表人物的作用表示過疑慮和批評<sup>⑧</sup>，在7月至9月當北京和各地所謂極「左」實踐及其思潮達到頂端時（以北京火燒英國駐華代辦處及全國性的各地區武鬥滋生、蔓延為例），毛恰在這一時期的外地巡視中就不止一次地說過：「要告訴革命造反派的頭頭和紅衛兵小將們，現在正是他們有可能犯錯誤的時候。」<sup>⑨</sup>實際上，毛到了9月之際已經不看重紅衛兵學生和造反派群眾了。

自1967年年初開始，在全國許多地方，隨着造反派群眾及其勢力的崛起，各地解放軍日益捲入當地的文革事務及糾紛，軍隊與造反派群眾及其勢力的矛盾、對峙甚至衝突不斷擴大和加深。毛澤東一再力圖讓各地解放軍大力支持造反派，力圖使二者的關係得以緩和或協調發展。但是，1967年武漢「七二零事件」中，武漢軍區領導人以及領導機關眾多幹部對於武漢地區激進造反派的打壓和對保守派群眾的支持，拒絕周恩來代表以毛為首的所謂文革「無產階級司令部」對他們的指責，特別是駐紮在武漢市城區的湖北省軍區獨立師官兵所舉行的聲勢浩大的武裝遊行示威和隨後所發生的圍攻、毆打中央文革小組大員的事件，都是此時正居住在武漢「七二零事件」中心地帶的毛所不願意看到的甚至所預料不及的，最終使毛迫不得已地離開武漢<sup>⑩</sup>。

稍後，毛澤東對以武漢軍區為代表的軍隊反對地方造反派的典型做法進行了嚴厲的批評和處理，加大了對軍隊一些高層領導幹部的打壓，加重了對已倒台的若干高級將領的懲罰，並發出了「武裝左派」的指示<sup>⑪</sup>。毛與全國性的軍隊之

毛以接見紅衛兵的方式，讓紅衛兵來北京「朝聖」和「取經」，觀摩和吸取北京的文革運作經驗，無形之中就促成了把紅衛兵運動作為使文革貫徹、普及、深入到全社會的「政治推土機」。毛在中央、在黨內、在全國找到了致使文革廣泛而又迅速地運行起來的模式。

間緊張的關係和矛盾在當時大有可能提到文革運動的日常議程上，毛與軍隊的相互關係在文革時期第一次處於相當嚴峻的關鍵時刻。

然而，在武漢「七二零事件」結束後不到兩個月，毛澤東就通過對「揪軍內一小撮」口號問題及當事人的處理，特別是對中央文革成員王力、關鋒的處置等措施，重新調整和加強了他與軍隊的聯繫。毛自覺不自覺地對於軍隊的文革主張和文革取向做出了「傾斜」，甚至做出了不管是毛情願與否的某種「妥協」。儘管毛受到了「七二零事件」的嚴重刺激或影響，但是他在此事件不久之後就清醒地意識到必須重整與解放軍的關係，特別是必須強化他與軍隊高、中層幹部的關係。一方面，毛既不能離開軍隊對他本人的支持，也不能失去軍隊對於文革的支柱性作用；另一方面，他既不允許軍隊各級幹部偏離或者游離他的文革大局的方向，也不容許軍隊高、中層幹部在文革問題上超脫他的制約或指揮。

其次，從毛澤東接見軍隊幹部的活動中，可以折射出毛在文革最初的兩三年裏對於黨的權力、政府權力和軍隊權力（黨權、政權、軍權）三者的不同作用有不同取向，尤其是從這些作用和取向中映現出的特殊內涵和色彩。毛在文革最初的一兩年，正是主要通過紅衛兵學生和造反派群眾，打亂了原有的中共黨的權力運作機制及權威實施體制，致使全國各地的政府權力機構陷於混亂甚至幾乎癱瘓，才得以把文革發動和推廣開來。在這一過程中，差不多唯有解放軍在整體上還相對保持完好，從總體上沒有失去基本的功能和職責，特別是上到軍隊的統帥機構下到軍隊的各級指揮機構，大致上依然運作如舊。從社會學分析的角度來講，文革初期的中共黨權和政權處於嚴重的、深刻的、廣泛的「失範」(anomie/anomy，又稱「失常」)狀態，而只有軍權在整體上保持了「正常」狀態。

從一次又一次大張旗鼓地接見軍隊幹部的做法，不難發現毛澤東在文革最初兩三年裏的種種舉措確切地表明：一方面，他實際上可以把他所領導的黨及其黨權置之不顧，使這個曾在毛率領下打下了新中國天下的黨所具有的各級組織工作和各級組織生活陷於約計三年左右的停頓或停滯；另一方面，他實際上幾乎對他所主導的政府及其政權棄之不理，使這個曾在毛領導下建設國家、管理社會的政府及其各級政權組織或機構，不是處在無法有序運作的混亂之中，就是瀕臨倒台、破裂和重組的危機之中。這一切，都既使昔日整個中國大陸的「黨—國家—社會」一體同構的文化結構和文化功能(毫無疑問，主要是政治結構和政治功能)發生了廣泛、急劇而又深切的裂變，又使過去長期運行的「黨權—政權—軍權」這三種權力並存的格局和傳統出現了總體性的缺失，甚至是全局性的坍塌。也就是說，在文革初期，毛把軍權看得高於、大於、重於黨權和政權，這不僅使得黨權和政權向軍權傾斜、復歸乃至屈從，而且通過黨權和政權的「軍權化」，毛完成了從文革最初不到兩年的以紅衛兵學生和造反派群眾為主體的第一個階段(即群眾運動的階段)，向以軍人為全國各地領導權力主體的第二個階段(事實上是軍人為文革主幹的階段)演進或轉變。

因而，這也就不難理解下面這個問題：為甚麼毛澤東從沒有像接見紅衛兵學生或者至少像接見軍隊幹部那樣大規模地、分批分期地，甚至專門地接見文革時期的黨政幹部，最多只是在接見軍隊幹部的活動以及有關的節日典禮等活動之中，有來京參加專業或生產或經濟等會議以及其他專門任務而人數相當有限的黨政幹部被順便「插入」上述的活動之中。毋庸置疑，在文革初期的三年多

在文革初期，毛把軍權看得高於、大於、重於黨權和政權，這不僅使得黨權和政權向軍權傾斜、復歸乃至屈從，而且通過黨權和政權的「軍權化」，毛完成了從文革最初以紅衛兵學生和造反派群眾為主體的第一個階段，向以軍人為全國各地領導權力主體的第二個階段演進或轉變。

如果說1967至1968年毛接見軍隊幹部是對前一年接見紅衛兵的歷史性「超越」，那麼也恰恰在這種「超越」中凝聚着1966年8月中共中央有關文件把文革說成「只能是群眾自己解放自己」、「自己教育自己」的「大革命」的謬誤、破滅和離棄。

時間裏，相比於黨政幹部及地方幹部，毛更加看重軍隊幹部，也更加重用軍隊幹部。

再則，從文革的歷史來看，毛澤東接見軍隊幹部意味着切實保證文革從上述第一個階段轉向第二個階段。很有意思的是，在文革最初的這兩個階段，亦即在文革初期的關鍵時刻或重要關頭，毛每每訴諸中共中央上層領導之外的力量來推進文革，從第一次訴諸的以青年學生和普通群眾為主的紅衛兵和造反派，到第二次訴諸的以解放軍高、中層幹部為主的幹部隊伍，毛不僅給文革注入了更多、更大的緣於他自己的意志和意圖的因素和特色，而且也使得文革無論在全局上還是在局部上，都更加必然地駛向了並非毛本人所能左右的不歸之路。毛接見軍隊幹部的活動是與前面所述的「軍人為文革主幹的階段」（第二個階段）密切相連的。在筆者看來，這個階段大致上是始於1967年、興於1968年，並於1969至1971年達到了頂峰和於1972年結束。非常值得提起的是，毛在1969年4月28日中共九屆一中全會上講話時，一開始不久，他就提及蘇聯和日本的媒體當時對中共九大產生的中央委員會人員構成所作的有關「軍事官僚體制」、「軍事官僚專政」的評論<sup>⑩</sup>。看來，毛很在乎這種評論，並在1970年8月的廬山會議上把這種「在乎」轉化為對林彪勢力尾大不掉的憂慮，轉化為在「九一三事件」之前通過所謂「挖牆腳」、「甩石頭」、「摻沙子」等一系列做法來削弱唯林彪馬首是瞻的軍隊幹部的作用，當然這些已是後話。

無論怎樣，毛澤東接見軍隊幹部的活動都是這種在中共九大前後形成並運轉起來的所謂「軍事官僚體制」或「軍事官僚專政」的一種鮮活的部分或有機的組成內容。這裏，略用數字來表示這種「軍事官僚體制」或「軍事官僚專政」的某些特徵。從1967年2月至1969年4月，解放軍每月投入「三支兩軍」工作的指戰員都在90餘萬人，1968年上半年每月平均在95萬多人<sup>⑪</sup>。截至1968年9月底，在全部成立的中國大陸29個省、市、自治區革命委員會當中，軍隊幹部出任主任的就佔有20個；在由軍隊幹部擔任縣以上革命委員會主任的，北京市佔78%，廣東省佔81%，遼寧省佔84%，山西省佔95%，雲南省佔97%，湖南省佔98%<sup>⑫</sup>，平均下來已逾90%。到1970年底，軍隊共有279萬人次參加了「三支兩軍」，其中約有4.9萬人擔任縣以上革命委員會委員的職務<sup>⑬</sup>。借用當時流行的一句話來形容那時的中國大陸：「七億人民七億兵，萬里江山萬里營」。

因而，如果說1967至1968年毛澤東接見軍隊幹部是對前一年接見紅衛兵的歷史性「超越」，那麼也恰恰在這種「超越」中凝聚着1966年8月中共中央有關文件把文革說成「只能是群眾自己解放自己」、「自己教育自己」<sup>⑭</sup>的「大革命」的謬誤、破滅和離棄。換言之，自1967年起，隨着軍隊勢力的廣泛介入和全盤干預，作為「群眾自己解放自己」、「自己教育自己」的文革，就已開始成為一齣荒唐與悲慘兼而有之的怪誕劇！正如吳法憲在其回憶錄中所提及的<sup>⑮</sup>：

「九大」以前，由於「文革」的衝擊，所有的地方政權基本上癱瘓了。毛澤東決定軍隊以「三支兩軍」的形式，接管了各級地方政權。毛澤東靠軍隊穩定了全國秩序，從而使軍隊在國家事務中起了一種特殊重要的作用。這種情況是當時客觀條件造成的，當時如果沒有軍隊的介入，很難設想國家將是一種怎樣的情況。因此，在「九大」中央委員會中，軍隊幹部佔了一大半，

當時的政治局共二十五人，軍隊幹部佔十四人。軍隊的勢力越來越大，林彪個人的威望也越來越高。

歷史地看來，基於文革的邏輯(假設文革還有邏輯的話)，1971年9月林彪的滅亡乃至稍後的軍隊勢力在文革大局中的消解，乃是文革的一種宿命。

### 三 集體觀見的特點

名義上，毛澤東接見軍隊幹部活動的對象大多是以解放軍各大總部、各大軍兵種、各大軍事院校、各大軍區、國防科委、軍事科學院、北京衛戍區等單位各自組織的「毛澤東思想學習班」、「活學活用毛澤東思想積極份子代表大會」、「學習毛主席著作積極份子代表大會」等的與會人員。例如，濟南軍區來京參加毛接見活動的「毛澤東思想學習班」成員，就有兩千多名團職以上的幹部。這些幹部中的許多人當時正在軍外的地方單位、部門或機構參加文革的「三支兩軍」等工作，在接到參加上述學習班的通知後，他們迅即報到。這兩千多名幹部先在濟南市的軍區有關駐地集合，參加有關的學習和動員會議，重點學習和反覆領會以毛為代表的中共歷史，進一步增強對毛個人的崇拜、敬仰和愛戴之情。稍後，他們乘上被稱為「毛主席專門派來」的原來行駛在國際列車線上的高級列車前往北京，居住於解放軍有關院校的宿舍，並在這些院校裏繼續進行「毛澤東思想學習班」的學習，隨時待命，等候毛的接見。

毛澤東接見軍隊幹部活動的每一次舉行，當時《人民日報》、《解放軍報》等大報以及解放軍各大單位的有關報刊上都會迅速地或適時地加以特別報導，並在隨後的數日裏連篇累牘地發表各類文章，歡呼慶祝，重點突出對毛的「四個無限」(即「無限熱愛毛主席，無限信仰毛主席，無限崇拜毛主席，無限忠誠毛主席」)和「四個一切」(即「一切想着毛主席，一切服從毛主席，一切緊跟毛主席，一切為着毛主席」)等主題的報導。其他媒體部門，例如中央新聞紀錄電影製片廠和解放軍八一電影製片廠也及時地攝製相關的紀錄影片，在各地廣泛放映，大加宣傳。

而受到毛澤東接見的軍隊幹部所在的原單位、部門或機構，更是一派歡呼雀躍，忙碌不已，他們不是有組織地連夜開大會、搞遊行、發賀電，就是集體性地立誓言、獻錦旗、表忠心，不一而足。而在北京受到毛接見的那些幹部，在接見之後所舉行的各種慶典性的、座談會式的、宣誓性的儀式或活動，更是熱鬧非凡，一浪高過一浪，令人目不暇接。這些受到毛接見的幹部回到原單位、部門或機構時，還受到了留守的廣大基層幹部和戰士的隆重歡迎。那些在京受到毛接見後還要繼續參加「三支兩軍」任務的軍隊幹部，回到地方單位、部門或機構時，也受到了地方群眾的熱烈歡迎。顯然，所有這些在軍內和軍外所營造出的氛圍，都是要強化軍內軍外對毛作為文革最高統帥和最高領袖之形象和地位的絕對認可和絕對服從。因而，差不多正是在接見軍隊幹部期間，文革時期對毛的個人崇拜和個人迷信活動達到了登峰造極的地步。這也從另一方面證明，毛在文革初始一是借助紅衛兵運動把對他的個人崇拜和個人迷信活動徹底推廣、普及開來，二是借助大規模接見軍隊幹部進而使對他的個人崇拜和個人迷信活動達到了無以復加的程度。

受到毛接見的幹部回到原單位、部門或機構時，受到了留守的廣大基層幹部和戰士及地方群眾的熱烈歡迎。這些在軍內和軍外所營造出的氛圍，都是要強化對毛作為文革最高統帥和最高領袖之形象和地位的絕對認可和絕對服從。

不同於接見紅衛兵的活動是在廣場或街道兩旁等露天場地舉行，毛澤東接見軍隊幹部的活動一般是在人民大會堂大禮堂或首都體育館舉行，主要是由於這兩個地方各自都可容納一萬餘人。在室內進行接見活動有其很大的優點：一是比較容易安排，二是保密性強，三是實施起來有序有度。毛接見軍隊幹部的活動有固定的形式，這類接見活動大約為時數十分鐘。毛一出現在主席台時，接見場地就會響起《東方紅》樂曲。毛首先步入接見會場主席台，隨其之後，林彪、周恩來以及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小組、中央軍委等負責人魚貫而入。毛一般是在主席台上來回走動，不斷鼓掌，頻頻向台下或周圍招手致意，而受到接見的人們，群情鼎沸，山呼萬歲。

值得注意的一點是，毛澤東在這類接見活動中從未做過大會講話或即興演講，也沒有其他中央領導人做過大會講話或報告。毛往往是在這類接見活動的尾聲，走向主席台一側，同來自解放軍各大有關單位的領導人（常常是總部、軍兵種、大軍區等副職以上的領導人）一一握手，還經常在握手其間對某些人物表示出自己的關注之情。例如，邱會作在回憶錄中記述到，1967年9月，毛在一次接見活動中，在主席台上與身旁的幹部一一握手，毛走到邱會作面前說：「這個是姓邱的。」「主席剛要往前走，又退回半步，一邊拉着我的手，一邊指着我說：『娃娃都有白頭髮了。』我當時非常激動，因為在這種場合，主席和誰多說幾句話都是莫大的榮幸。我看主席這次接見軍隊幹部，心裏似乎好受多了，軍隊還是他的，軍隊幹部也還是他的。」<sup>⑩</sup>

又如，原解放軍工程兵司令員陳士榘的兒子陳人康回憶到，毛澤東於1968年2月10日在首都體育館接見裝甲兵、工程兵、炮兵、鐵道兵、通信兵、防化兵六個兵種和高等軍事學院、政治學院「學習毛主席著作積極份子代表大會」代表，「這幾個兵種的首長也有緣見到他們崇拜的毛主席。記得那天體育館裏歡呼聲、掌聲、激動的哭泣聲震耳欲聾。『毛主席萬歲！萬萬歲！』的真情呼喊使得這個巨大的場館一下子變得渺小。父親感到，只要是毛主席到哪裏，哪裏都會變得渺小。」「父親說，好多年輕的戰士踩在座椅上狂呼亂跳。後來，幾千個座椅都要修理。」在走到工程兵人員所在的位置時，毛見到陳士榘，眼裏發出久別重逢之光，伸出手，領着陳向前走了幾步，讓記者拍照，令陳激動不已<sup>⑪</sup>。

在接見軍隊幹部的活動中，有一次是「特例」，那就是1968年3月25日凌晨，毛澤東接見在京解放軍各大單位及其所屬的在京部隊的團職以上幹部。這次接見實際上緣於所謂「楊（成武）、余（立金）、傅（崇碧）事件」<sup>⑫</sup>，而不同於以往對來京參加「毛澤東思想學習班」一類軍隊幹部的接見。在3月24日夜間9點30分至25日凌晨1時30分林彪等人作了有關「楊、余、傅事件」的講話之後，毛於25日凌晨1時35分出場，接見在場的一萬餘名軍隊幹部，這無疑是向在場的人們宣示他對「楊、余、傅事件」處理的首肯，進而更加顯示出他本人的文革權威，特別是他對文革時期軍隊問題的決定權。非常有意思的是，《人民日報》、《解放軍報》等報刊對於這次接見活動的報導沒有像以往報導毛的接見活動那樣，都是在次日就加以大幅報導，而是在第三天即3月27日才作了報導，並且也沒有像以往那樣標明毛接見的確切時間，只是說毛澤東「最近接見了軍隊幹部」<sup>⑬</sup>。這一點看來似乎饒有餘味。

更加富有意味的是，在幾乎是毛澤東最後一次大規模接見軍隊幹部的活動中，即在1968年8月15日，毛特別請來了「首都工農兵毛澤東思想宣傳隊」、「首

毛在接見軍隊幹部的活動中從未做過大會講話或即興演講，也沒有其他中央領導人做過大會講話或報告。毛往往是在接見活動的尾聲，走向主席台一側，同來自解放軍各大有關單位的領導人一一握手，還經常在握手其間對某些人物表示關注之情。

都工人毛澤東思想宣傳隊」和「首都工人的代表」。毛讓這些代表參加接見活動，是出自對這些代表的安撫和慰問，即對7月27日由他決定派出的三萬多工人宣傳隊進駐清華大學而遭到清華造反派的抵抗並發生嚴重的流血犧牲事件所作的一種「善後之舉」。在《人民日報》、《解放軍報》等報刊8月16日關於這次接見的報導上，都把被接見人數相對不多的這些代表列在被接見的軍隊人員單位名字之前，以顯示出對這些代表的重視或關愛。今天看來，正是毛派出了由其身邊8341部隊幹部所領導的工人宣傳隊進駐清華大學，才促使清華大學發生「七二七事件」，標誌着紅衛兵運動和造反派運動的破產，標誌着文革第一個階段即群眾運動階段的結束，進而也標誌着軍隊幹部真正成為文革新階段的主幹的開始或繼續深入。

正是毛派出了由其身邊8341部隊幹部所領導的工人宣傳隊進駐清華大學，才促使清華大學發生「七二七事件」，標誌着紅衛兵運動和造反派運動的破產，標誌着文革第一個階段即群眾運動階段的結束，進而也標誌着軍隊幹部真正成為文革新階段的主幹的開始或繼續深入。

### 註釋

- ① 關於毛澤東文革初期接見解放軍十餘萬名團職以上幹部的信息，可參見《人民日報》、《解放軍報》當時的一系列報導。例如，《解放軍報》，1967年7月8日，第3468號；1968年8月16日，第3871號等相關報導。
- ② 程光：《心靈的對話——邱會作與兒子談文化大革命》，上冊（香港：北星出版社，2011）。
- ③ 程光：《心靈的對話》，上冊，頁157。「三支兩軍」是指文革中解放軍的「支左、支工、支農、軍訓、軍管」。
- ④⑥ 程光：《心靈的對話》，上冊，頁157。
- ⑤ 李作鵬：《李作鵬回憶錄》，下卷（香港：北星出版社，2011），頁626-27。
- ⑦⑩ 〈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關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1966年8月8日），宋永毅主編：《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第二版（香港：香港中文大學中國研究服務中心，2006）。
- ⑧ 〈毛澤東接見卡博和巴盧庫時的談話（節錄）〉（1967年2月3日），《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第二版；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逢先知、金沖及主編：《毛澤東傳（1949-1976）》，下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3），頁1489-90。
- ⑨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十二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頁388。
- ⑩ 關於武漢「七二零事件」的詳細記述，參見徐海亮編著：《東湖風雲錄——武漢文革的群眾記憶》（香港：銀河出版社，2005）；徐海亮：《武漢「七二〇」事件實錄》（香港：中國文化傳播出版社，2010）。
- ⑪⑫ 卜偉華：《「砸爛舊世界」——文化大革命的動亂與浩劫（1966-1968）》（香港：香港中文大學當代中國文化研究中心，2008），頁577；668-71。
- ⑬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十三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頁35。
- ⑭ 鄧禮峰：〈「三支兩軍」述論〉，《當代中國史研究》，2001年第6期，頁41。
- ⑮⑯ 李可、郝生章：《「文化大革命」中的人民解放軍》（北京：中共黨史資料出版社，1989），頁244；241。
- ⑰ 吳法憲：《歲月艱難——吳法憲回憶錄》，下卷（香港：北星出版社，2006），頁822。
- ⑱ 邱會作：《邱會作回憶錄》，下冊（香港：新世紀出版及傳媒有限公司，2011），頁538。
- ⑲ 陳人康策劃、口述，金山、陳義風著：《一生緊隨毛澤東——回憶我的父親開國上將陳士榘》（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頁113-14。
- ⑳ 參見《解放軍報》，1968年3月27日，第3729號。